

迎着曙光

——原华中党校“上海队”、江淮工作团
部分同志战斗历程纪实

集体回忆 叶鸣整理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四十年前曾在上海从事地下斗争的30多位老共产党员，于1988年金秋时节在安徽省蚌埠市聚会，共叙战斗情谊。大家心情振奋，思绪万千。回想当年，为了迎接新中国的曙光，大家冲破黎明前的黑暗，从上海来到设在苏北解放区的华中党校，又从党校出发紧随解放大军和江淮区党委，经过长途跋涉，来到蚌埠市，参加新解放地区的接管工作，转眼近半个世纪。为了把这段不平凡的经历记录下来，大家进行了座谈，决定成立“华中党校‘上海队’、江淮工作团史料编辑委员会”；征集回忆录，提供给有关部门，作为史料；并推举叶鸣执笔，根据回忆的材料，整理出一篇纪实报告。这就是本文产生的缘起。经过三年来的征集，共收到来信来稿七十余篇。本文就是根据这些信稿提供的资料综合整理而成的。

胜利的转移

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不顾中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建立独立富强新中国的愿望，坚持独裁，发动内战，出卖民族利益，掠夺镇压人民。

1946年，美蒋先是玩弄假和谈、真备战的阴谋，接着撕毁了解和谈协议，国民党军队在美国支持下大举向解放区进攻。解放区军民以自卫战争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和尔后的重点进攻。同时，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的地区（以下简称“蒋管区”），各种危机日益严重，广大人民空前觉醒。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蒋管区的爱国民主运动也在向前发展，逐步形成了对反动统治进行斗争的第二条战线。当时的上海，就是第二条战线的主阵地之一。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组织的领导之下，上海市的职工、学生同全市各界人民一道，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斗争，有力地配合了第一条战线的战斗。

1947年6月以后，解放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解放区战场由战略防御转入了战略进攻。蒋管区反动当局，在经济上苛捐杂税，横征暴敛，滥发纸币，导致通货恶性膨胀，物价扶摇直上，民不聊生；在政治上，加紧实行独裁专制的法西斯统治。这些都进一步激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蒋管区的爱国民主运动不断高涨。反动当局为了进行垂死挣扎，加紧了对上海人民的镇压。他们到处搜捕工运、学运中的骨干分子，首先是中共地下党员。上海市陷入了更加严酷的白色恐怖之中。1948年4月21日，上海电力公司工会理事、共产党员王孝和等13人，由于叛徒出卖，遭反动当局逮捕。他们在狱中与敌人开展坚决的斗争。9月30日，王孝和同志英勇就义。1948年5月9日，在幼稚师范专科学校任职的共产党员、女中分区委领导成员蔡怡曾遭敌人逮捕，在狱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身体受到极大摧残。她英勇不屈，始终没有泄露党的任何机密。在党组织的全力营救下，于同年8月出狱。

1948年8月26日午夜，反动当局又发起了秘密大逮捕。有358人上了黑名单，包括18所大学、9所专科学校、6所中小学和永安公司、时代周报社等一批单位的共产党员和党外积极分子。由于地下党组织事先获得信息后，即分头通知党员和积极分子隐蔽、疏散，敌人的大规模逮捕计划未能得逞。接着，反动当局的特别刑事法庭又发出“传票”、“拘票”，许多同志随时可能受到迫害。

在积极营救被捕同志的同时，党组织继续做好疏散隐蔽工作。疏散隐蔽的去向，有的在市区，有的在郊区或附近的县市；有的是投亲靠友，有的由组织上予以安排。他们虽然东躲西藏、一日数惊，或者在小阁楼、小黑屋里一蹲就是几个星期、几个月，但是，为了革命事业的需要，他们义无反顾地认真地执行了组织的决定。他们暂时安身的处所，有的是上层社会的家庭，条件比较优越；有的是贫苦的劳动者之家，条件非常艰苦。在掩护他们的家庭中，有的成员是党和爱国民主运动的同情者；也有的成员自己就是中共地下党员。对于这些投奔而来的亲友或素不相识的人，不但要安排好他们的生活，并且要冒着身家性命的危险去保证他们的安全。而为了正义事业和共同的目标，掩护者们义不容辞地承担了这些重担。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解放区迅速扩大，特别是新解放的城市，急需熟悉城市情况的干部。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上海市委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在1948年6、7月间，即形成了撤退、输送两千名干部（职工1千名，学生、教师1千名）的计划，决定把已经暴露身份和可能暴露身份的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迅速撤离上海，输送到解放区去。敌人“八·二

六”大逮捕，使这项工作更显紧迫。于是，一场安全转移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的秘密交通战全面展开了。

当时，地下交通线的输送方向主要有：苏北、皖西大别山、鄂北大洪山、浙东四明山等地的解放区。上海地下交通战线的同志们经过积极努力，不辞艰难困苦，千方百计地开辟了这批交通线后，夜以继日地护送撤退人员进入解放区。在这期间，他们还继续利用各种关系和途径努力开辟新的路线，例如去青岛的路线，去华北甚至去东北的路线等。而其中比较稳定、健全的还是去苏北解放区的几条路线。

解放区是地下党员们一贯向往的地方，接到撤退通知的同志们，首先要接好地下交通员的关系，按照地下交通的要求进行一系列的准备。同时，要在保守组织机密的前提下，做好家庭的工作。往往要找一个借口，假托到外地去工作或上学等，争取家庭的支持。有些同志已经结婚成家的，还要安排好家庭生活。有不少同志的母亲，虽然也隐隐约约地知道子女的去向，但出于母爱，总是千方百计地给予支持和帮助。然后，还要摆脱敌人的监视和追捕，悄然地离开上海。例如，蔡怡曾在出狱后，仍然受到特务的监视，出门即有尾巴盯梢。在这种情况下，经过党组织的精心安排，终于在特务的眼皮下离开上海，进入苏北解放区。

地下交通工作是很艰苦的。由于工作处于地下状态，必须十分细致，而且准备冒一定的风险。当撤退人员的名单、接头地点、接关系的标志口号，由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各系统陆续转到交通系统后，总联络员即将任务分配给各线交通员，分批送走。每批二三人至五六人不等。撤退人员离开上海之前，有的要交出本人的蒋管区国民身份证，然后按照

他们新改的化名和身份发给改制的身份证。交出的身份证留下再改制给别人使用；有的用别人的身份证换上自己的照片；有的就用自己原来的身份证，必要时把内容改填一下。旅费一般由撤退人员自筹或通过组织互济解决。出发前交通员向撤退人员介绍旅途及关卡情况；研究如果遇到麻烦时每个人的假口供和应付办法，一般是两人一组，以一定的社会关系搭配起来，并按国民身份证及假口供的要求进行化装；有时还要检查所携带的行李是否合乎要求，并且布置好抵达目的地的关系和口号，等等。在途中，各组之间要装着互不相识，不聚集在一起，不交谈，并拉开一定距离，混在众多旅客中间尾随交通员行动。从安全出发，一般均乘夜车离沪，争取翌日天黑以前进入解放区的边沿地区，尽量减少在敌占区停留时间。因此，路上要一鼓作气地连续行进，在进入边沿地区以后才能稍事休息。

下面所记载的，是圣约翰大学王培根（郭集五）等同志离沪时的亲身经历：

在上海茂名南路，国泰电影院附近，有一栋花园式的房屋。在这一带，当时还不怎么繁华，是一个在闹市中比较幽静的处所。周围的邻居，有上层社会的中国人，也有西洋人和白俄。这里就是许福基的家。许福基是圣约翰大学经济系的中共地下党支部委员，高高的个子，西装笔挺，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平时沉默寡言，文质彬彬，还经常带着一丝微笑，谁也不会怀疑他是共产党员。而且，面对这十分洋气而体面的房子，谁又能怀疑里面竟住有共产党员呢？许福基他们经常通宵达旦地在这里开支委会，研究对敌斗争问题。

1948年6月3日，圣约翰大学“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军国主义大会”遭到特务逞凶破坏以后，组织上就安排圣约翰大学毕业班学生、经济系中共地下党支部委员王培根住在许福基的家里。

许福基家的正房在二楼和三楼，底层很矮，像个不显眼的半地下室，王培根就住在里面。8月初，敌人以户口总抽查为名搜捕地下党员和进步分子，组织上又要他转移至浦东新场镇的周善延同志家暂时隐蔽，从浦东回来后，仍住许福基家。在8月26日前，敌人策划大搜捕时，地下党组织已获得情报，掌握了敌人所开列的逮捕对象名单。8月23日上午，负责联系王培根所在党支部的胡翠鑫来了，她把敌人将要采取行动的情况通知了他们。并告诉他们，王培根和江佩衡（即江从青，已隐蔽）都已上了黑名单，嘱咐他们遵守纪律，不要暴露。王培根当时听了并不紧张，因为早有思想准备，也有多次转移隐蔽的经历。至于家里是否承受得了这突如其来的搜捕，他也不十分担心。因为在转移住处之前，他已向母亲说明了发生意外的可能，并将事先拟好的“遗失图章启事”稿交给了她，要她在家中出事时，即速去登《申报》，用这个方式给自己传递信息。后来，这个“启事”果然登了报，但王培根早已隐蔽了起来。自从接到组织上的通知之日起，他就断绝了与外界的联系，除了上级领导和几位支委外，不同其他人见面。王住的房间后面还连着一小间贮藏室，没有窗户，不通风，门关上后里面漆黑，能容纳两、三人站立，当有人来时，他就躲在里面。这间贮藏室帮了他的大忙。不过，当时炎暑未消，闷在里面也是怪不好受的。

敌人大搜捕的第二天下午，胡翠鑫就来许福基家，告知

昨晚敌人已去王家搜捕王培根。隔了一天，又来告诉他施家溥同志在觉园门口被捕的情况（施当时在学联工作）。以后又得知，敌人还到圣约翰大学宿舍和校友会等处逮捕王培根，都没有得手。在那种严酷的环境里，党组织掌握情况之快，行动之迅速，使王培根惊叹不已。

大概在9月5日，胡翠鑫又来了，她一进门就告诉王培根：组织上已决定要他撤离上海到苏北解放区去，但要化装成商人模样，并约定时间，要他到经济系支委张文芸家里与交通员见面，当面演习化装。她又叫王记住一个由七八位数字组成的编码，这是到目的地后，接关系、证明身份时使用的。王听了以后，既高兴又激动。因为，解放区是他早已向往的地方。

化装需要衣服，出走需要钱，也需要有一个理由，家庭这一关是要疏通的。王培根的借口是：去香港转英国，上伦敦大学。这个疏通的任务就落到了许福基身上。许先后去了两次，是冒了风险的。在出事后，有些不三不四的人在王家附近守候了好几天。但为了掩护战友，许福基勇敢机智地完成了这项任务。在第二次去王家时，他带回了一个崭新的大皮箱和三百三十元金圆券（当时合六亿六千万旧法币，是一笔大数目了）。皮箱里除了几套西装、毛衣和日常替换的衣服外，还有化装需用的蓝布长衫、中装短衫、中装裤、布鞋、球鞋等物，连牙刷牙膏也新备了一套。看得出来，这是王培根的母亲为他整理的，也可以想像，她老人家那时候的心情是怎样的了。王培根的母亲对他的活动不是一点没有数的，她知道她儿子有活动，但不知道在干些什么；也知道有危险，但出于母爱，对儿子是支持的。很多事她都瞒着王培

根的父亲，在经济上也悄悄地接济他。

几天后的一个上午，王培根带着化装衣物按时去张文芸家里与交通员见面。9时正，交通员来了，是个男同志，瘦瘦的，中等身材，一般打扮，没有通报姓名，他也不便问。交通员要王培根穿好衣服鞋子，看了看，又将他的头发拢了拢，搞乱了原来的发式，又几次转身看了看，最后又把他的眼镜摘去，直到满意为止。他还查看了王的国民身份证，因为王的身份证已经不能再用了，必须另外搞一张假的。于是，王培根就把哥哥的身份证拿来代替。交通员仔细端详了身份证上所贴的照片以后，说：“很像，可以用。”交通员告诉他，一共有5个人同行，但没有告诉另外4人是谁。只是讲：“到达苏北解放区前要由几个交通员分段带，我只带到扬州。在扬州城外，如果见到有人同我作很亲切的交谈，你们就要跟着那人走。”交通员又交代了路上需要注意的事项：特别是火车站里特务很多，为了避免特务注意，上车后不要坐在靠站台方向的窗口；行李只能带些替换衣服；箱子不能带；也不能戴手表。最后，交通员还告诉他：动身的日期是9月20日，乘9点钟的夜车；车票在8时整由交通员在车站进口处交给他们；事先可以在车站对面吃点东西；到8时进车站；上车后交通员会来找他们的，等等。以后，王培根在路上的行动都是按交通员的话办的。临走前，王培根除了已经花掉的几块钱和留下二十元金圆券外，其余的钱都交给了组织。所带行李中除了一件毛衣、一顶蚊帐和几件替换衣服外，其余也都交组织上处理了。

9月20日来临了，一切都准备就绪，随身行李只有一个网兜，倒也有八九斤重。许福基同志看了看，随手把自己的

一条薄棉被塞到王培根的网兜里说：“加上它，行李虽然稍微重了一些，但还是带去为好，有用处。”的确，时值秋天，晚上凉意渐浓，被子是不可缺少的。6点半，到动身时间了，许福基去叫了一辆三轮车来，又替王培根拎着网兜，穿过花园，打开那扇虚掩着的大门，送他上了车。三轮车夫蹬着车渐渐由慢而快地向前走。

王培根请三轮车夫走新闸路或爱文义路（现北京西路）到泥城桥向北拐弯。可是，三轮车夫却好像没有听见似的，也可能认为他是“乡里人”，想让他开开眼界，竟从王家沙拐进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过新世界直入南京路（现南京东路），到浙江路向北拐，走的是当年上海最繁华的地段，也是他最忌走的一段。他那么个打扮，大模大样地招摇过市，是很容易惹人注意的。他在车上提心吊胆，尽量避免东张西望。

北站到了，按照交通员的布置，王培根选定正对车站大门的一家饭馆要了些点心慢慢地吃着，为的是消磨时间，也可以随时注意车站的人流。8时正，他出了饭馆走向车站入口处，在人群中见到了交通员。交通员将赴镇江的火车票塞给了他，随即又消失在人群之中。在经过剪票口的时候，他特别谨慎，因为常有特务在这里守候。但剪票时乱哄哄的情况，对他们是有利的。

他手拿一张三等车厢的车票，终于上了火车。那时的火车根本不对号，哪节车厢空就上哪一节，他按照嘱咐上了接近车尾的一节车厢。这天的旅客特别拥挤，不要想有个座位，连找个立足之处也困难，他只好站在两节车厢间的过道上，四周有旅客裹住，灯光又暗，正好为他掩护。9点正，火

车开了，速度不快，是站站停的慢车。大概过了一个钟头，他见到车厢走道中间挤来了交通员。交通员虽然也看见了他，但却一声不响地又往前挤去了。他知道，这是在“点名”——检查一下，5个人都到齐没有，是否都安全。但是，其他4位究竟是谁？他还是全然不知。

第二天（9月21日），大约是清晨4点钟，镇江车站到了。接着摆渡过江，从六圩乘长途汽车到扬州。这时，王培根才看清，与他同行的其他4个同志，原来也都是圣约翰大学的。他们是周文藻、华世璋、陈仲文和周慎安。在化装通过封锁线，来到苏北解放区以后，他们分别改名为华周、华楚、叶小挺、王大江，王培根则改名为郭集五。

这里再介绍一下益友社的郑剑风等同志离开上海前往苏北解放区的经过：

1948年10月中旬，中共地下党委委员蔡东园召集战斗在益友社第一线的地下党员郑剑风（曾任党组书记）、沈家驷、马则先（都是党组成员）、鲍士用（衣着业支部书记）、周泰5个人，并有负责交通工作的程韵启参加，在威海卫路郑剑风家中开会，分析了革命形势和敌人的动向。益友社是中共上海地下职委领导的店职员工进步团体，广泛联系着各行各业的职工群众，在爱国民主运动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因而也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注意。为了保护益友社内的党员骨干力量，组织上决定要他们5人首批从益友社第一线撤出来，由第二线的同志接替他们的工作。不多日，程韵启又把这5位同志集中在一起，传达了党组织要他们一起撤往苏北解放区的决定。郑剑风已由组织决定改名为郑剑秋，负责带

队前往，并已电报苏北。其他4人可以自己改名，再由程韵启上报。于是其余4人分别化名为鲍子坤（鲍士用）、沈仲实（沈家驷）、华图（马则先）、周昌（周泰）。程韵启还要他们要做好几项准备工作：一是做好家属工作，安排好家庭；二是处理好社会职业方面的有关事项；三是准备好化装用的农民服装和日常用品，但不宜多带。此后，大家就开始准备。马则先到福建路估衣店买了套蓝粗布单衣、一件粗毛衣，其他就带了些日用物品和内衣，打了一个小布包。然后又与表哥韩西雅（地下党员）同去王店老家向父母亲辞行，佯称去武汉工作，使他们放心。第二天，也就是10月26日早晨，他们返回上海，到达北站时大约上午9点多钟。在出站口，马的弟弟马导农、表弟韩振欧正在守候他们，并告诉他们：刚才有人来找马则先，要马导农设法尽快转告马则先立即离开上海。马则先和韩西雅两人出站后，在一个隐蔽的地方分析一下情况，认为这一紧急通知肯定是因为出了问题，可是马则先家估计还没有问题，所以组织上派人到家里送通知。但马则先必须立即离开上海，问题是离开到哪里去？与谁联系？怎样去？一系列问题得不到解决。既然马则先家估计还没有问题，他们两人作了分工：马则先回家做好离沪准备；韩西雅去找组织问明情况和如何撤离等问题。随后，韩回来说，刚才是马翼来通知的。由于地下党员高云樵被捕，加速了撤离工作，要马则先立即去苏州周泰亲戚家集中，并交待，凡路上遇到熟人，即便是一起撤离的其他4人，也只当不认识，不打招呼，以防止可能已被跟踪而遭到株连。高云樵曾经是益友社补习夜校副校长，已转到其他方面工作，是被反动当局的松沪警备司令部逮捕的（后经组织营救保释

出狱)。这样，马则先就以紧张而沉着的心情穿着日常的西服，提了衣包，立即登上电车来到北站。他买了最早最快的上海——南京特快车票，乘坐头等车厢，大约下午两点钟到达苏州。出站后，步行到中途，遇见鲍士用，他们都严格执行纪律，互不相识般地默默前行，直到他们先后进入集中地点。郑剑风、沈家驷、周泰已经先期到达。他们5人好像是久别重逢一样，兴奋雀跃，欢声笑语不断。上海地下职委派来刘燕如同志给他们作交通。刘是益友社原党组书记，做政治交通很有经验，同他们又很熟悉，大家又畅谈一番。刘燕如同志说，还要等个人一起出发。接着，上海地下党派到苏州东山小学当校长的韩运先（改名韩庾瑾）也来报到。刘燕如同志向他们6人交代从苏州出发到苏北解放区的线路和注意事项，告诉他们万一遇到敌人时应付的方法，并把他们编为三组，两人一组，为每组都设计了一定的“社会关系”，以应对敌人查问。马则先与韩运先以表姊弟相称。傍晚，他们一同上街，到小饭店饱餐一顿。到深夜，他们全部化装成跑单帮的小贩式农民，戴眼镜的把眼镜收起来，每组保持二、三十公尺距离，步行到火车站，准备乘火车前往镇江。为了与衣着身份相称，他们都坐上最便宜的铁皮棚车。车上没有座位，只能席地而坐。整个车厢里，只有一盏煤油马灯照明，空气污浊，拥挤不堪。不过，这种环境倒是一种很好的掩护。大家既兴奋又警惕，闭眼假睡，但谁也睡不着。10月27日，天还未亮，已到镇江。他们过江后即乘长途汽车到扬州城外，然后绕道徒步前进，当晚即到达苏北解放区的边沿地区——公道桥。

上海市委原计划从上海撤退2000人，实际撤退1700多人，包括党员1200多人。其中去苏北解放区的共1262人，包

括党员891人。曾经在上海轰轰烈烈的爱国民主运动中发挥骨干作用的1700多名中共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就这样在敌人军警宪特的“鼻子底下”悄然消失。这是一场在胜利形势下进行的阵地大转移，是一场胜利进行的阵地大转移，是一场以胜利告终的阵地大转移，是一场为了迎接全国胜利而进行的阵地大转移。

迈 步 越 天 堑

从上海撤退到苏北解放区，必须渡过长江，越过敌人在长江两岸所设置的军事封锁线。“长江天堑”历来是军事斗争的天然防线，是兵家必争之地。1948年间，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苏北解放区不断扩大，不但在广大的农村拥有巩固的后方，而且，游击区已经伸延到长江北岸的一些边沿地带。因此，企图借江防地利负隅顽抗的敌人，在长江两岸凡是他们尚能控制的地方，都是戒备森严的。

为了把从上海撤退的同志们转送到苏北解放区，先后在沿江开辟了多条交通线，包括：青龙港线，即由南通的青龙港，进入华中九分区；靖江线，即由靖江的张黄港、新港、八圩港和东兴，进入华中一分区；口岸线，即由泰兴的口岸镇进入华中一分区；江都线，即由江都的三江营、八江口，进入华中二分区；益林线，即由扬州经宝应赴益林，进入华中五分区；淮南线，即由六圩港、瓜洲镇或十二圩港，经扬州外围，进入位于淮河南岸的江淮一分区。在渡过长江到达北岸后，有的可以立即进入游击区，有的还要在敌占区继续行进，然后从陆路或水路通过封锁线进入解放区。在撤退途中，绝大多数同志都能按预定计划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虽有少数同志在途中遇到险情，

但在交通员和撤退人员的密切配合、机智应付下，也大都能化险为夷。

下面所记述的，是秘密交通员小王、毛正民、陈演带领三批地下党员分别经过口岸、扬州、宝应进入苏北解放区的情况：

1948年10月6日晚，一身小商人打扮的交通员小王挤进上海北站，他的任务是带领五位地下党员前往解放区。他们是：大同大学学生张文尧（张敦）、钱景霞（钱云）、王淑真（王水），复旦大学学生司徒汉，中华职工学校学生汪乾三（汪浩）。他们已经事先碰好头，并且化装、分组：张文尧和钱景霞为一组，扮成假夫妻，他们本是一对恋人，扮起假夫妻来当然是非常自然的罗！张的身份是公务人员。王淑真和汪乾三为另一组，关系是姊弟，分别以女佣人和学徒的身份，“奔丧”去泰州。司徒汉则装扮成一个跑单帮的。交通员小王警惕地扫视着候车室每一个角落，他知道，他所带领的这5位同志正受到反动当局的追捕，随时都有可能出危险，丝毫马虎不得，小王站在剪票口附近，目送他们分为三组通过检查，顺利进站上车后，自己也挤上了火车。车厢里面异常拥挤嘈杂，空气混浊，挤满了跑单帮的。他们找不到座位，只得坐在车厢地板上。凭着交通员的经验，他知道，在这样拥挤杂乱的环境里，反动军警是不愿侧身进来检查的。虽然这样，大家仍然按照事先的要求，避免同别人讲话，假装瞌睡，保持着高度警惕。7日凌晨4点，还是满天星斗时，车到镇江站。大家分组挤在人流中出站。镇江站外一溜开着许多茶馆。大家迎面看到了“义顺园”的大招牌，这里是约定的一个“点名”处。小王坐在靠门口处，

光
曙

看到各组的人陆续到达，分占不同桌面，目光相接，互不交谈。洗脸、吃早点后，离开茶馆，乘人力车去江边码头，点名上船，分散坐定。晨7时开船，朝霞映红金山、焦山，江面泛起一片绚丽多采的流光。在这样环境里，大家的心情似乎松懈开来，小王用目光示意，提醒大家不能麻痹。果然，不一会宪兵警察进舱巡查，一个女宪兵把怀疑目光对准王水，检查她的身份证，但这些身份证都是战斗在警察局里的同志拿出来的，钢印、图章一应俱全，所带物品也与身份相符，女宪兵再三查看，也找不到一点破绽。中午12时，船到口岸却靠不上码头，泊在江心，小船蚁集，往来驳运。这里是最后一道关卡，气氛不同，小王看到各组遵照他的嘱咐，从警察把守的口子上一一通过，感到一阵轻松：这次任务，看来又是顺利完成。现在剩下的事，只要在口岸镇上，把肥皂交给内线交通，同志们就会从肥皂传递中得到信息，神不知鬼不觉地跟内线交通进入解放区的。

正当小王庆幸任务即将完成时，出现了特殊情况。内线交通不知何故没有按时到来。他通知大家，在饭店吃饭等候，自己则按照预先制定的第二方案，急忙去找当地关系带路。约莫过了两个小时，小王和一个满头银发的老奶奶急匆匆地赶到镇上。这时，口岸镇上已船去人空，清清静静，大家在饭馆里无法再呆下去，只得在街上溜跶。在一家旅店门口，店主人正缠住他们，硬要他们住店。老奶奶是当地人，知道这店主人正是敌特坐探，情势紧急。她赶紧上前，一把拉住汪乾三说：“大侄儿，你怎么今天才到？叫我好找！”他回头一看，一位满头白发、身材瘦小、衣着干净利索的老奶奶，手里掂着几块肥皂，目光里含意深长，他马上明白了。老

奶奶一面说“快跟我家去”，一面拉着他就走。其他各组也缓缓跟着，离开了口岸。好一个革命的老奶奶，靠着她的沉着机智，迷惑了敌人，摆脱了险境。

离开口岸镇，各组拉开距离，跟着老奶奶沿着通向泰州的公路前进。时近黄昏，行人稀少，沿途分布着敌人的碉堡群，哨兵的刺刀在秋日的余晖里闪烁着寒光。他们缓缓地从哨兵面前通过。老奶奶选择两处哨兵都望不到的地方，领他们下公路，走小道，沿着田埂急匆匆地往前赶，她吃力地迈动两只缠过的小脚，额头上渗出了点点汗珠。路上除他们以外，再也看不见人，田里长满了荞麦，一切是这样的宁静，只有从老奶奶匆匆赶路的紧张神态中，才能体会到这里是危机四伏的边沿地带。赶了一阵路，老奶奶放慢了脚步，神色稍懈。后来打破沉默，同他们拉起呱来。啊！这就是说，真到家了！这儿已是“山那边”——大家日夜向往的革命故乡！

1948年秋，从事店员工作的地下党员毛正民受命担任交通员，跑淮南线。他的上级胡沛然同志指定他与“陆先生”（戚原）联系。由陆交给他北撤同志的名单和联系方法，再由他联系张牧（沈沉）及苏北扬州中学的交通员，分别安排、带领北撤的同志进入解放区。淮南线在扬州公道桥有一联络站，由田尔（郑坚）负责接送上海来的同志。

11月下旬的一天，他按“陆先生”约定的时间，在八仙桥黄金大戏院门口同陆见面。陆对他说：“你跑的这条线，最近不大安全，敌人在这一带扫荡，这次你要更加小心，带两位同志去吧。你联系牛耳（即钮瞻崖，又名史东）就可以了，

另一位夏山（即夏家簏）可以由牛耳转告”。毛正民想，跑一趟不容易，只带两位同志太少了。他跑过“单帮”，有一点应付国民党军警的办法。前几批七八人一块走，不都安全到达了吗！但是，这是组织的安排，他不好多说。

几天以后，他依照“陆先生”的交待，在中午十二时赶到静安寺，观赏庙门前的一汪池水和一杆华表，等待那位据说是瘦长个子的小伙子前来接头。12点15分，约定的时间到了，他走到十字路口，放眼望去，“老大房”门前的电车站旁，站着一位年龄与他相仿的青年，白净脸面，瘦长个子，手里拿着一份报纸在看，似乎是等车的样子。他便走上前去问路：“去中山公园怎么走法？”瘦长个子青年说：“我们同路，一起走吧。”依照约定的暗号，接上了关系。

11月30日晚上，毛正民准时到达北火车站。“陆先生”也来了，交给毛正民三张上海至镇江的火车票，又简要地叮咛一番。毛正民然后到入口处会齐钮、夏两位，三人一同进站上车。不久，火车开动向西北疾驶。车轮滚滚，人声喧嚷，汇成一曲别有情趣的乐章。他们默默对坐，“闭目养神”，尽量不惹人注意。

他们都是小贩模样。夏家簏和钮瞻崖戴绒帽、穿长袍，象个落魄的小市民。行囊里装了一些香烟、肥皂、白糖、毛巾等乡间需要的日用品和少许替换衣服。夏家簏是在他的朋友苏雪中家里换装的，把身上一件半新的驼绒袍子换了朋友父亲的旧棉袍。钮瞻崖穿的中式罩衫和罩裤都是中华业余图书馆地下党支部书记孟澄从他母亲那里要来的。罩衫还是她的三儿子去延安时留下的纪念品。这位令人尊敬的同情革命的老人，知道自己的儿子们在做什么，总是默默地，似乎毫